



安源党校旧址

党校的早期岁月

□ 谢煜桐

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3年3月马克思主义学校创办，大体上可以算是党校创立的酝酿期和发展初期。正如党还处于幼年时期一样，党校的发展也经历了步履蹒跚艰辛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学校的成立，可以说是船出三峡，豁然开朗了。

党是在事业发展中逐渐认识到办党校之必要和重要性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就专门设有“工人学校”一节，内中规定，“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党的二大制定了第一个党章，并在《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强调：“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

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第一次提出，“中央宣传部应当在党报上加重党内教育的工作”，并明确指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作出的《宣传问题决议案》对党校问题作出更细致的规定：“群众的鼓动和宣传中一定要有一种鼓动和宣传的人才。所以开办各地党校确是一种重要的工作。”

“现时党内所有的力量，只能开办下列两种形式的党校：（一）各地委之下的普通的党校，造成群众的鼓动员。这种党校应当是工人的，……（二）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教育一班政治智识较高的同志和已经有工作经验的同志——造成能够办党的、能够做成负责任的工作的人才。”以上规定涉及开办党校的班次、对象和教育方针，已经深入到党校办学具体要求的层面。12月，中共中央在第68号通告中再次提出：“关于宣传的决议案，工人俱乐部，普通及高级党校，照我们现在的力量都可办到，务要实行。”可见党中央对于开办党校之事已是非常迫切。

1926年2月，中央特别会议作出《开办最高党校问题》的决定，提出在北京及广州各办一长期党校。7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在“编译工作问题”中专门规定了党校的教本及普通党员教育的大纲，具体包括《革命常识》《党务常识》等内容。9月22日中央通告第十八号规定：“沪、粤、湘、鄂四区都即须设立普通党校，以养成党的及职工运动的下级干部人材。”

1927年4月29日，在武汉召开的党的五大提出：如果我们能在武汉坚守住，我们就在这里成立党校。但在这一年的7月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天地顿时失色，党中央创办一所大型党校的设想当时无法实现了。

据考证，我们党最早以党校的名义办学培养干部，始于刘少奇1923年11月在安源开办的安源党校，这是我们党的第一所党校，刘少奇兼任校长并讲授《共产党宣言》。其后，1925年10月，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在北京新街口蒋养房胡同和北京大学三院二楼创办中共北方区委党校，校长是罗亦农。此外，1925年10月至1927年初，根据党中央创办党校的决议，上海、广州及湘、鄂、赣等地先后创办了多所党校，为革命培养了一批干部。

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大革命失败后，随着中央苏区的建立，举办党校养成干部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党的事业需要革命干部，干部需要革命教育。在这种形势下，1931年11月，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叶坪召开了苏维埃区域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成立了苏区中央局党校，任弼时任校长。



□ 徐廷华

那些生命中的信任、守候与坚强

□ 韩 冰

2020年1月26日，大年初二，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派出的前方记者，我启程前往武汉，在武汉坚持工作了91天。我们用镜头和采访完成了一次次心灵的陪伴，和这里坚守的人们一起勇敢地面对疫情。这91天的经历，将给我的人生留下深刻的记忆，无论是每一个无比珍贵的当下，还是在未来的路上。

性命相托的信任

出发时刻，和每一位选择来前方的人一样，来自家人的牵挂、担忧，一点都不会少，但父母给予我的，更多的还是坚定的鼓励和支持，或许是在父辈的人生经历中，也都曾有过一次次无愧于心、勇往直前的逆行。

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妈妈是河北省第一批派出医疗队的队员，当时只有21岁的她，第一次直面生死。多年之后，妈妈回忆起，她站在废墟上，腿不停地抖，手不知道该放在哪里，就只能紧紧地抓着身上背着军挎包带子。没有病房，连搭简易帐篷的平地都没有，但是，到处是哭喊声，求助声，怎么办？妈妈说，当时不知从哪儿跑过来一个小女孩，一把抓住她的手，喊着“姑姑，快救救我的弟弟，他就埋在那里”。那一刻，妈妈说，她咬紧牙关克制住恐惧、发抖，她能做的、需要做的，就是去救人。

同样的话，我再次听到，是在采访江苏援鄂医疗队ICU主治医师张倩时。在武汉疫情最危急的时候，全国各地医疗工作者驰援武汉，江苏省人民医院派出了200多人的精锐力量，张倩和同事们凌晨2点抵达武汉后，建制制地接管了武汉市第一医院的重症监护病区，从防护培训到收治病人，只用了20个小时。张倩是医疗队里第一批进入隔离病房的医生，第一天就是大夜班，当时病房大概三四个小时就收满了病人，工作量非常大。第一次穿上防护服的张倩和同事们感到很闷，有的护士还吐了。有的医生在急救病人时，出现了防护服撕裂的情况，大家都比较担心。尽管有各种突发状况和困难，张倩他们还是以最快的速度，短短3天时间，就稳定住了病区内5个危重症患者的病情。此后便是和时间赛跑的日子，3个月里，张倩和同事们克服极度疲劳和感染危险，治愈了一个又一个患者，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名患者出院。

采访的时候，张倩说：“我来武汉，就是来寻找初心的。”我问：“你的初心是什么？”她答：“救人，竭尽全力地去救人。”1985年出生的张倩，2003年非典时，正在备战高考，当在电视上目睹了全国医护人员救治病患的场景时，这个不善言辞的姑娘，毫不犹豫把高考志愿填上了南京医学院。经过了8年苦读、9年住院医生的磨炼，她说，自己早已准备好了，为了救人随时可以出发。

在救助生命面前，信任能够给人以信心和力量。我曾问过妈妈，当年，为什么那个小女孩跑过来，第一句话喊的是“姑姑”，妈妈说，当时她也没想明白，一个陌生的孩子会这样称呼她。或许在灾难面前，人与人的关系是超越血缘的，或许在某些特殊时刻，我们都需要亲人般的信任和依靠。妈妈说，她一辈子都记得那句话、那个场景。做医生的，如果说，

有遗憾，大概就是没有救治更多的人，对不住这份性命相托的信任。在这次疫情中，正是无数个张倩怀抱着初心，在生死关头，奋不顾身地救治生命，谱写着人间的爱与温暖。

坚持不懈的守候

如果说，信任是一种“良药”，而守候就是最长久的信任。疫情暴发时，武汉市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陈菁带领的团队最早改造了病房，争分夺秒地投入病患救治中。在这位身体单薄瘦弱的女医生主管的病区里，走出了100多位康复的新冠肺炎患者，我问她，秘诀是什么，她答，“就一个字——守，病人把命交给了你，你要千方百计地守住他们啊”。在武汉儿童医院的新生儿病房，儿科主任曾凌空和同事們面对的大多是出生刚刚没多久，根本无法交流的“特殊患者”。还是靠着一个“守”字，坚持了86天，把每一个小毛毛平安地送到了父母身边。曾凌空最长的一次值班28个小时没合过眼，他说，守住一个小毛毛的生命，就是守住了一个家的希望。

在搜集各种新闻线索的过程中，我读到了一封特别的家书。说它特别，是因为它是一个成年的儿子写给医生妈妈的心里话。“守候”这两个字在这对母子这里更是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母亲周燕也是武汉儿童医院的一位医生，儿子王柘钦是个“90后”大学生，就读于吉林大学医学院。儿子5岁的时候，周燕就离开家到武汉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学院学习，从硕士到博士，一路读下来就是7年，因此错过了儿子的童年。工作后，常常守候在患者身边的周燕仍然不能陪伴在儿子身边，儿子长大了，也跟自己渐渐“生疏”了，这一度让周燕感到很愧疚。

今年1月底，刚刚结束了一年援助新疆医疗工作的周燕，本想好好陪陪放寒假回家的儿子。可是，刚回到武汉，周燕就接到了她所负责的产科三病区要改造为新冠肺炎孕产妇隔离病区的任务。作为产科主任，周燕带领科室的12名同事，在48小时内就完成了病区改造，开始接收疑似新冠肺炎的孕产妇。自此，坚守在患者身边一千就是3个月。

周燕怎么也想不到，平时沉默寡言的儿子，会在这个时候给自己写了一封家书。儿子在信中表达了对母亲



工作职责的理解，对母亲敬业精神的尊敬，和自己选择学医的坚定职业志向。读信的时候，周燕的心扑腾扑腾的，久久不能平静。这位医生妈妈决定也用回信的方式，和儿子说说心里话：“我是个不称职的母亲。然而疫情下，当无声的文字记录下你对我赞赏的心，我才知道，岁月成就了你感恩的心。我油然而生一种母亲的自豪感，……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你的榜样，而现在，我才发现，妈妈的坚持，源自你的成长……”

疫情期间，周燕守候在患者旁边，常常一天要做两三场手术，她总是又稳又准，护士们说，周大夫在，我们就有了定心丸。周燕这里有确诊的产妇，有确诊的新生儿，有疑似感染的婴儿，还有陆续入院等待排查的产妇。高风险、高感染时刻存在。周燕说，任何时候患者都是第一位的。危急关头、病患面前，只有决断和守候，决断就是要判断准确、积极施救，守候就是时时监测，守住机会、挽救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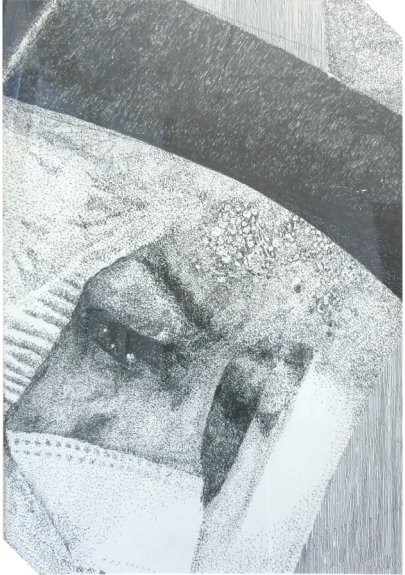
通过特殊时期的这封书信，周燕母子的关系有了变化，儿子理解了母亲，理解了母亲的守候，母亲看到了儿子的变化与成长。

医者特鲁多在墓碑上，曾写下，“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抚慰”。在这场疫情中，我们见证了可敬的医务人员们竭尽全力的救治、守候与帮助。

永不言弃的坚强

完成了报道任务后，我和摄像搭档档细细盘点了一下这3个月里我们陆续跑遍的武汉市18家医院。其中，一位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的患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就是金银潭医院首批治愈出院患者陈清波。2月中旬，我们见到陈清波的时候，他已经结束了14天的医学隔离观察，身体状况基本恢复到了得病前的状况，一日三餐很规律，每天晚上还可以坚持做半小时的有氧运动。这样的情景，让人根本无法想象，这是一个被医院下过3次病危通知单的人。陈清波是福建南安人，今年是他来武汉打拼的第20个年头，他的女儿和儿子都在武汉出生长大，武汉已经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疫情暴发前，陈清波在武汉武昌区开了一家蔬菜经营部批发蔬菜，还开了一个配送中心。生活虽然劳碌，但一家人和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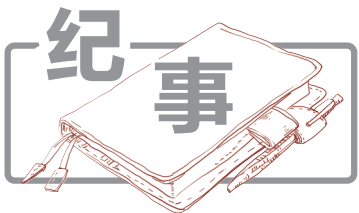


睦睦很有奔头。但不幸的是，疫情来了，他感染了新冠肺炎，而且病情非常严重。转院到金银潭医院时的陈清波已陷入了昏迷，经过医护人员48小时的全力救治，陈清波终于清醒过来，恢复了意识。医护人员不断地给陈清波鼓劲，“你这么年轻，一定要有信心，你能扛过这一关，家人都在等着你呢，你们一家人以后还要一起迎接好多好多的新年呢。”那一刻，陈清波说，他知道自己一定能挺过来，他相信身边这些专业又敬业的医生，更相信生的信念和爱的力量会帮助他渡过难关。经过治疗，5天后，陈清波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转入普通病房。又经过了半个多月的救治，陈清波终于治愈出院，和家人团聚了。

陈清波决定捐献血浆，我们陪着他一起来到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我问他，你打算献多少血浆？毕竟他刚刚康复。陈清波没有任何犹豫，脱口而出，“我按最大限度献。”走出献血室，武汉又开始下雪了，气温再一次骤降到零度以下，可是看到按着胳膊，还没来得及穿上外套的陈清波脸上的笑容，会觉得周围一下子就温暖了。他向我们举起了捐献400毫升血浆的证明书，兴奋地说：“这就是一枚‘徽章’啊，比我痊愈出院还珍贵的纪念。”

陈清波通过我们的节目说出了他的心里话：“希望大家坚定信心、积极乐观，主动配合医生治疗，相信自己、相信医生，我们都可以战胜病魔。同时，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小小努力，让更多的治愈患者加入捐献血浆的队伍中。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当写完这篇文稿时，返京的我早已结束了隔离期，接到了新的任务。回想起奔赴武汉时雨雪纷飞的日子，回想起这座英雄的城市和人民，回想起救死扶伤的医生、倾力付出的志愿者和全国人民的驰援助、众志成城，常常会让我泪流满面，激动不已。那份生命中的信任、守候和坚强将成为我最难忘的记忆。如今，冰雪已经消融，盛夏的绿意生机勃勃，愿爱与希望护佑每一个生命。



丁小文（江苏省委党校） 钢笔画

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暴风雨荡涤了人间的污泥浊水，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痛快。为什么雪莱赞美暴风雨中的雄鹰，为什么高尔基讴歌暴风雨中的海燕，是因为暴风雨中的鹰击长空，燕穿霄汉是何等的震撼与壮观。

眼前的雨还在绵绵地下着，越来越密。透过雨帘，街上的一切变得朦胧了，朦胧在一片和谐的薄幕中，见到的只是来来回回游动着的五彩缤纷的雨衣、雨伞。



蒙蒙细雨中”，宋代诗人释辉用“蒙蒙”二字道出了春雨的韵味。“杏花、春雨、江南”，江南的春天总是和雨连在一起的，试想如果抽掉了那如织的细雨，江南怎还会有她的意态万千、妙曼如烟？

青年时候的我看到雨，就会想起戴望舒的《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而又寂寥的雨巷……”那雨，带着丝丝的忧愁，淡淡的清香，剪不断，打不散。这才明了，雨天，是会搅动人的情感的。仿佛自己也走进了那条悠长而又寂寥的雨巷，逢着那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上世纪80年代初，我赴浙江绍兴、杭州、舟山等地采风，半个月的时间都笼罩在温润的雨幕中。有一天